书海泛舟

理论工作者应承担时代赋予的使命

——评《需要理论而且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

□ 丰子义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诚哉斯言。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中华民族五千年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曾经给世界文明带来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其地位和价值为世人所称道。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之下日渐式微，以至于一定意义上出现文化危机。今日中国发展成为经济大国，在与世界的交流与碰撞中，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亟待重振，中国的理论创造正当其时。可以预见，“学术中国”“理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必将从理想变为现实。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反映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养，同时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努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取得了显著成就，学科体系不断完备，学术体系初现规模，学术影响日益增强。但是，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人才队伍总体素质亟待提高，学风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总体上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种状况的出现，对于我们理论工作者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时代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时代正呼唤着理论创新。理论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肩负起这一历史重任，并通过不懈的努力，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和发展，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以引领而不是辜负这一时代。

由中央党校科研部、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编的《需要理论而且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中央党校出版社2016年7月版），正是适应这种时代要求而产生的。该著作深入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认为习近平总书记“5·17”讲话是一篇指导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该书汇集了一批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精神深入解读的成果，既有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背景、社会功能、发展战略、研究导向的论述，又有对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国际传播等方面的分析，观点鲜明，论述精当，体现了作者强烈的学术担当和深厚的学术素养。在作者团队当中，既有学界公认的宿将，又有活跃在学界的中坚，还有一批崭露头角的学术新秀。从他们的论述中，可以发现沉甸甸的学术责任感，同时又看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希望与前景。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后不久，中央党校科研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就及时推出这样的专著，对于理论工作者坚定信心、明确方向、开阔思路、扎实工作大有裨益。



党员正心修身的必修课

□ 朱康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的‘心学’，是党员正心修身的必修课。”明代中叶儒学家王阳明在走朱熹“向外觅理”路线而不通的境况下，转向陆九渊的方法，“向内觅理”，经过种种磨难，终于大悟“良知”之本。人们将陆、王二人的学说合称“陆王心学”，或直称“心学”。这一体系实际上是对孟子尽心知性、悟得良知良能以达“天”的思想发展而来。

儒家思想及其宗旨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内圣外王，就是内修圣贤道德，外做福民事业；即内在地达到圣人修为的境界，而后去做治理社会和国家乃至造福整个天下的大事业。在历史上，“心学”的倡导者和后继者既展现了儒家内圣修为的博大精深，又不忘随事磨练，在当时也做出了足可传世的事功。除却其历史局限性，阳明心学凸显了内在道德修为的重要性，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张扬了主体道德的自觉能动性，对于今天的共产党人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具有重要启示。

共产党人不同于其他政党的地方在于，它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以造福最广大人民群众为直接目的，并以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为最高理想。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即通过改造外部客观世界和内在主观世界来完成。共产党人提升道德修养就是改造主观世界。当前，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不是栽倒在才干上，而是栽倒在德性上；不是毁在做事上，而是毁在做人上；不是外王事功不行，而是内圣修为欠缺或扭曲而使外王事功发生变质。说得严重一点，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不注重道德修养，不注重作风建设，就会“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导致人心涣散、道德沦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党性锤炼的“心学”举措，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弘扬者和创新者，以共产主义信仰为内圣修养之内容，追求实践唯物主义者知行合一之根本，内修为民之德，外践福民之行。具体而言，如同“心学”从“一念入微处”下功夫的主张一样，共产党人应注意将法律制度、党纪党规的他律，转化为内在德性的自律。比如内心应敬畏法纪，“三严”以为内圣修养，“三实”以为外王事业，将内外贯通、知行统一起来。这就要求我们，时刻注重反躬自省，强化慎独意识，从做好小事、管好小节起步，见善思齐，有过立改；尤其是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更要始终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从形成共产主义道德意愿和情感出发，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最后落实到道德实践即自觉践行上。由“心”开始，激发出共产主义德性修养的源泉动力，落实于造福人民的外王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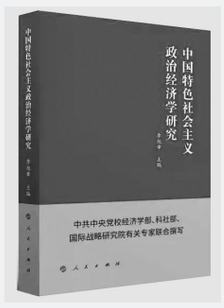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改造主观世界和人生修养的论述不多，他们更多的是讲改造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和“修养”这两个概念是由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是对中国特有的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实践论》有一个重要观点是，不认真地改造主观世界，就不能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修养”命题的提出，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将中国传统的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扩展到“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增强党员思想意识修养，保持党的纯洁性发挥了重大作用。周恩来制订的《我的修养要则》表明，整风运动反过来促进传统修养在现代的继承和发展。革命家吴玉章说，“我常常把我们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处事的方法，与中国古圣贤所谓‘修己治人’之道相比较，只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只有共产党员才能真正实行人类最高的道德”。党的优良作风之一，就是运用自我批评等方法，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找到自己的弱点。这说明，党员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不仅仅是靠外部的灌输和党纪等硬约束来形成，还主要靠自觉的党性修养和内心意志力。这显然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修身精髓——“心学”的发扬。

修身立德，不仅是立身之本，更是从政之基。共产党人特别是其领导干部掌握公权，道德修养比普通群众更重要，领导干部必须始终把道德修养看作是基础性、前提性的活动。以德修身，实质就是澡雪精神、自律心性，并以此福民服众。这就意味着党员领导干部在其位、谋其职、用好权的同时，应注重发挥人格感召力，用道德力量驾驭权力这柄“双刃剑”，真正让权力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它已经融纳并超越中华文化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崇高追求。通过教育和濡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党性落实到自觉的德行上。把党性修养与具体的生活情境结合起来，把外向式的改造世界与内向式的反求诸己即改造自我融为一体，始能达到共产主义信仰中知行合一的“心学”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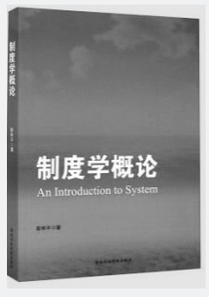
干部国学苑

好书推荐

书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作者：李旭章 主编
出版：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
内容简介：本书挖掘了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的本真意义，并以《资本论》的市场逻辑为例，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生命力。全书由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关于市场经济的逻辑、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社会主义财政与财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金融与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城乡发展一体化理论与实践、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理论与政策、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理论与实践等17章构成。



书名：《制度学概论》
作者：彭和平 著
出版：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5年11月
内容简介：制度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和管理手段，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本书是一本研究性的著作，按照教材的体系来编写，深入探讨了制度的构成和类型、制度的起源与发展、制度规定、制度执行、制度角色和制度人、制度效力、制度观、制度运行与创新等一系列问题。



书名：《乌克兰危机警示录》
作者：况腊生 著
出版：国防工业出版社2016年5月
内容简介：本书由程开甲院士题写书名，彭光谦少将、石世印少将分别作序推荐。作者以敏锐的观察力和独到的见解对乌克兰危机进行了全面解读，从俄乌对垒、政府军与武装民兵的残酷决战，到第二战场美欧与俄的相互制裁、无形杀手的各方网络攻防战、争取正统的法律战、相互对抗的心理威慑战等方方面面。此外，还对这场危机给我国和平发展道路的警示等问题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思考和探索。



漫步在历史的空间中

——读《地图上的中国历史丛书》

□ 周 鹏

当一个民族出发追寻复兴的伟大梦想时，必先要找准自己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坐标，这样才能回答自身由何而来、如何而来、因何而来等关键命题，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出发追梦的原点，才能真正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追梦原点的坐标，是由时间和空间所标定的。时间的维度是历史，空间的维度则是地理。其实，历史上的空间和空间上的历史，本就密不可分。历史和文化，当然包括了关于过去空间的信息——诸如先民们繁衍生息的地理环境，创立政权的疆域区划，以及与之相关的游牧迁徙、对外交流、开疆扩土等诸多活动。而地理和疆域也并不单纯代表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和对地域的人为划分，它们的背后，也凝结着先祖们世世代代对这片土地的苦心经营和坚定捍卫，承载着因“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而产生的深刻民族记忆。

对历史和空间互动关系的记录和研究，是我国史学的一贯传统。中国史学，过去叫史地之学。古人读书讲究“左图右史”，并且把地理当作经世之学。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还有魏源的《海国图志》，都可以反映这个传统。葛剑雄先生主编的《地图上的中国历史丛书》则是对这一传统的又一体现。《地图上的中国历史丛书》分《疆域与政区》《民族大迁徙》《交流与交通》《古都与城市》等四册，通过不同的侧面，多角度地向我们介绍中国历史上的空间和空间上的中国历史，帮助我们以此为纽带，向五千年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汲取精神养分。

回顾中国历史上的疆域与政区，我们能够感受先民们开疆辟土的无畏。中华民族的始祖从黄河流域一带百战立国，然后向外开拓，秦统六合，南征百越，汉控西域，北逐匈奴，隋唐数击突厥，宋代开拓台湾澎湖，元代管辖西藏，明清终于奠定今天的版图基础。其间，边疆地区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历朝历代在边疆实施过羁縻府州、督护府、军镇，节度使，将军、理藩院、办事大臣等诸多制度，不断拓展生存空间，坚定维护疆域完整。对内为了维护政权的统一稳定，先后实施分封制和郡县制，然后在郡县基础上衍生出省、州、府、道、路等区划形式。并且为加强中央集权，在确定区划上不仅依据“山川形便”，还人为打破自然地理的区域，使行政区界限“犬牙交错”，以便提高中央政府的掌控能力。

回顾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迁徙，我们应当珍惜民族融合的不易。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民族融合的历史，中间充满了悲欢离合。不同的时期里，不知有多少个民族曾在神州大地上叱咤风云。长城内外，不同的民族在战场曾彼此兵戎相见，也曾出现“千里烟绝，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的惨剧。但是百川终到海，多民族的融合团结终究是历史的主流。羯胡、氐族、羌族、鲜卑族、突厥人、吐谷浑人、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等等，这些听上去遥远而又熟悉的名字，代表着不同时代，或从漠北草原，或从西域戈壁，或从白山黑水诞生的部族，他们从四面八方归聚而来，但是最终血脉都融于中华民族。曾经的边塞和沙场，现在都成了各族人民把手言欢的家园。

回顾中国历史上的交流与交通，我们得以体会交流开放的曲折。夏商周时代，随着奴隶制国家的出现，才形成了水陆交通网的雏形。在那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秦以咸阳为中心修筑驰道，颁布“车同轨”的法令，才使车辆可以运行于全国。汉朝开辟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并且建立从东南沿海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隋唐开通了以洛阳为中心，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形成了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国内交通网络以及通向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外的七条交通干线。元朝开辟了通往云贵高原和黑龙江奴儿干地区的道路交通，将京杭大运河裁弯取直。明清以南京和北京为中心，建立起密如蛛网的国内水路交通体系，最终奠定了我们近代交通网络的基础。历史上，张骞通西域，甘英使大秦，玄奘西行求法，鉴真东渡传经，还出现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其间虽然西域时通时绝，海域时开时禁，但向外探索交流的步伐却始终坚定地走到今天。

回顾中国历史上的古都与城市，我们可以了解建设创业的艰辛。商朝的都城“自契至汤八迁”，汤至盘庚，又有五迁，直至盘庚迁殷方得安定。周文王建都于丰，周武王再建都于镐，周公旦营成周洛邑于伊洛，镇服东方。之后，一代又一代的先民接续经营，才陆续建成了诸多名城巨镇。古人在城市的营造上不局限于满足现实的需要，还渲染出浓重的礼制色彩，表达出他们对秩序和正统的观念。比如，《周礼·考工记》就记载了国都理想的形态：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又比如，汉朝因为中央集权的确立和巩固，推崇皇权成为国家礼制的中心需要，皇帝祭天之礼成为每年国家最重要的典礼。根据南郊祭天、北郊祭地的方案，城市的布局承天之序，形成了现在坐北朝南的格局。这些都是我们迄今为止都遵循的城市构建法则，也体现了先人超卓的智慧和中华传统延续的力量。

忘记就意味着背叛，温故则可以知新。在当前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中，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在争夺着对历史上的空间和空间上的历史的话语权。因此，铭记历史，唤醒记忆就显得尤为必要。漫步在历史的空间中，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华民族是诞生于世界东方的民族，独特的历史环境培育了我们独特的民族性格、精神特质和文化传统，从而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同时，也让我们倍加珍惜拥有的广阔疆土、对外交往的便利条件以及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更加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书而思

用典释义

“为学之道，必本于思”。“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

【讲话原文】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眼界广阔、知识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深，涉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个领域，涉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事、党建等各个方面，不下大气力、不下苦功夫是难以掌握真谛、融会贯通的。“为学之道，必本于思。”“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我看过一些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其结论未必正确，但在研究和考据马克思主义文本上，功课做得还是可以的。相比之下，我们一些研究在这方面的努力就远远不够了。恩格斯曾经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不能采取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态度。有的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读几本，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有悖于科学精神。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

【出处】

为学之道，必本于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故《书》曰：“思曰睿，睿作圣”。思所以睿，睿所以圣也。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而学者有无思虑而得者，何也？曰：以无思无虑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无思无虑为不思而自以为得者，未之有也。

——（北宋）程颐《二程遗书·伊川先生语》

【解读】

程颐，洛阳伊川人，世称伊川先生。与其胞兄程颢共创“洛学”，为理学奠定了基础，世称“二程”。

上述用典是“二程”关于“学”与“思”关系的阐述。最早提出学思关系的儒家学者是孔子。孔子认为“学”与“思”应当有机地结合，不可偏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并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孔子主张学思并重、学思结合，在此基础上，“二程”提出了“学原于思”“学莫贵于思”的观点。程颐认为：“为学之道，必本于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意思是说正确的学习方法，必须以思考为根本。思考了就能得到真知，不思考就得不到真知。进而又指出：“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不深思就不能掌握道理；不经过深思而得到的知识，即令一时得到了，也容易失掉。此句亦见于《曾国藩家书》，故常被误认为是曾国藩的经典语句。

“二程”为何将“思”放到如此突出重要的位置？程颐答道：“思所以睿，睿所以圣也。”“思”是达到睿智、圣明的必由之路。“二程”的观点，强调了“学”的手段性与“思”的目的性，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关于学思关系的辩证思考。

（杨立新）